

浙江常山：乡镇“编外”干部期盼晚年生活有保障

本报通讯员田红

郑乐水、邹金良、刘传生、汪家俊、胡恭……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如今他们的身躯已经开始佝偻，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流露着无奈和期望。他们说：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关注，基于我们为乡镇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情况，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被选调到乡镇工作的“编外”干部

这些老人都是优秀农村干部，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农村被选调到浙江省常山县辖区内的各个乡镇政府工作。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乡镇的落实，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常山县政府也把当时的“社队企业管理局”更名为“乡镇企业管理局”，并在各乡镇建起了乡镇工办机构，同时配备了3至5名工作人员。除工办主任由副乡长兼任外，其他人员都是通过乡镇党委、政府集体研究，从各村中选调出来的，是当时具有一定素质和业务能力的优秀农村干部。这些人员随即被安排到乡镇工办担任工办会计、统计或出纳，也有的担任了工办支部书记或副主任等领导职务。

1991年，浙江省衢州市政府根据乡镇企

业发展的需要，下达了“关于定编招收区、乡（镇）工办人员为集体所有制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通知”，衢州市劳动人事局、乡镇企业局又联合下文《衢政（1991）51号文件》，公布了常山县乡镇工办的定编总数为120人。当时，常山县各乡镇工办在岗人员都在此次定编范围之内。之后，常山县先后出台了常乡企（1992）101、145号文件，实行一次性定编及分批落实招收的办法。1991年度招工指标就确定为36人，工龄从进工办时间算起，并且确定乡镇工办以后按每年增加200万元销售收入增招一人的办法分批落实乡镇“编外”干部“转正”问题。

然而，这个政策只进行了一年，之后就再无“编外”人员搭上这趟顺风车。

乡镇企业发展了，转正无期了

据了解，常山县的乡镇企业在1992年至1995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常山县白石镇原统计兼出纳邹金良介绍，当时他所在的镇乡办工业企业有9个，村办工业企业有17个，个体工业企业达到了36个。整个乡镇的工业产值从1991年到1997年，从400万元提高到了1300多万元。何家乡工办会计、统计、档案员兼工办书记何忠喜说，他所在的何家乡1991年工业产值是198万元，1994

年已经达到了680万元。张燕龙所在的辉埠镇，从1985年为269万元，到1999年的工业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这些老“编外”乡镇干部说，1991年后，大多数乡镇的销售收入都增长了，到了1995年，很多乡镇的工业产值都已经达到了千万元以上的水平了。

“虽然第一批进编的人员没有我们，但我觉得以后还有希望进编，所以没着急，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着。”一个老人这样对笔者说。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各乡的企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突飞猛进，但除了县劳动人事局、乡镇企业局又招收了两个有“关系”的人员外，县政府再也没有按有关文件办理过第二批进编手续，“编外”干部们一年过了再盼着下一年，可那根“胡萝卜”从此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临近退休，“编外”干部被清退

1999年3月，常山县委出台了《县委办（99）29号文件》，要求在3月底清退在各乡镇机关中使用的各种临时人员和借用人员。其实，这之前清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从前被选调上来的人员成了清退对象。

“那时，我们已经在乡镇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少的也工作了10多年了。有

的‘编外’干部甚至已经担任了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并有专业技术职称，还有的是已经有了县乡镇企业管理局颁发的工作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有的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有的接近退休年龄，结果是被统统清退回家了。”

据了解，原常山县大桥乡工办会计郑乐水，1970年被调到乡里担任工业会计，连续工作了31年，2000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已61岁；原白石镇工办统计员邹金良，1979年被调到镇里任统计员，连续工作了20年，1998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55岁，回家时镇政府发给5000元经济补偿金；原球川镇工办会计划师，1979年被调到镇里担任会计，连续工作了20年，1998年被辞退回家，回家时镇政府发给5000元经济补偿金；原龙溪乡工办会计胡家俊今年70岁，1981年被调到乡工办任会计兼统计，连续工作了24年，2005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61岁，乡政府发给经济补偿金5000元；原同弓乡工办会计划胡恭仁，1976年从村里调到乡里工作，后担任乡工办会计兼统计，连续工作28年，2002年被辞退回家，辞退时59岁，回家时由乡政府发给经济补偿金8400元……

由于这些被辞退的乡镇工办人员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他们被辞退后，生活大多立即就陷入了困境。

基本生活保障成最高要求

对于乡镇工办人员被辞退后的生存状况，衢州市及常山县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比较清楚，原衢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还曾为此专门作过批示，常山县28位人大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曾在县十四届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妥善落实原乡镇工办人员晚年生活保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议案，但时至今日，这些工办人员的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和解决。

如今，这些已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工办人员说起他们的经历，都不免伤心：“我们在乡镇政府大院内和公务员一起工作了20多年，我们见证了乡镇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乡镇企业的起步、引导、服务、建设中，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我们是有着非凡贡献的一个群体。”老人们说，其实他们当时还不止做过这些工作：“工办作为乡镇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不仅要完成工办的本职工作，还要参加乡镇计划生育工作，征收五费一税，以及防旱抗涝、防火救灾等乡镇政府的其他职能工作。”“现在我们老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尽早解决我们的困难，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辽宁抚顺
查获18箱高考作弊器材

本报讯（记者郑耀辉）眼镜盒、格尺、手表、牙套……这些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如今却和高考作弊联系在一起。近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在配合当地媒体的配合下，一举查获了18箱高考作弊器材。

“知识基础差怎么办？成绩不理想怎么办？选择我们就是选择成功！”这一阵儿，在抚顺市各区的公交车站牌上、电线杆及墙壁上，随处可见与高考有关的张贴小广告，引起了当地媒体记者的注意。它们化装成买主，深入到藏有高考作弊器材的窝点。“这个适合你，4000元一套。”一男子指着一个装在盒子里的格尺介绍，他说：“这个格尺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开机后用这个特殊的笔一碰固定的地方，就能从格尺的屏幕上看到考场外面传进来的答案。”随着男子的演示，果然在这个貌似格尺的高考作弊器材上看到一块宽1厘米左右，长2.5厘米左右的屏幕，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记者抽身，随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依法搜查，警方查出的各种高考作弊器材整装满满了18个50多厘米宽、30多厘米长的纸箱。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浙江省政府
严处大埠违法排污事件

新华社电（记者李璐 李亚彪）浙江省政府26日通报了对奉化市大埠工业区块部分企业违法排污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4家企业违法排污企业被关闭，奉化市环保局副局长被免职。

据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在这一事件中，奉化市环保部门违反国家及浙江省有关建设项目建设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管理的规定、越权审批4家企业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环评，对企业环境行为日常监管不到位，对群众举报的该区块废气污染问题查处不力；奉化市萧王庙街道对其辖区内的大埠工业区块电镀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不同程度存在污水超标排放、偷排行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

浙江省有关方面除对4家涉事企业实施关闭，并处以高限处罚、加倍追缴排污费、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责任人行政拘留处罚外，还对奉化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进行诫勉谈话，对奉化市环保局局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对奉化市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对其他相关负有责任的公职人员分别给予诫勉谈话、行政记过、行政警告、党内警告处分。奉化市委、市政府已就此事向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昆明非法集资等
经济犯罪呈蔓延之势

新华社电（记者李倩）据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通报：当前，昆明市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屡打不绝，甚至有蔓延之势。仅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全市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非法集资类案件35起，涉及利益受损群众25800余人，涉案金额10.2亿余元，人均经济损失3.97万元。

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警方的调查和分析，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包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办储蓄业务；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变动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以预售、合作经营、投资入股或加盟等为名，承诺回报，收取订金、股金、加盟费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等形式。



上海世博会开园以来，大量外宾通过铁路进出上海，为有效服务外宾，保障执法工作开展，上海铁路警方专门抽调了36名具有六级英语证书的青年民警，在铁路上海站、上海南站设立了多个“英语服务岗”，主要负责外国旅客的问讯求助、报警报案以及安检、处置突发事件等涉外警务工作，确保了广大外宾平安出行。
林荣贵摄

湖南将“防火墙”工程纳入公安机关绩效考核

本报讯（通讯员李莉 记者龙巨澜）5月20日，湖南省将构筑“防火墙”工程纳入公安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和干部绩效考核内容，与单位和个人评优评先直接挂钩。

在湖南省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暨社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会上，副省长刘伟强调：当前湖南省正处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的关键时期，许多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工期紧、任务重，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大量使用，给火灾预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他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成立以一把手任组长，治安、刑侦、消防等相关部门警种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把构筑“防火墙”工程纳入公安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和干部绩效考核内容，与单位和个人评优评先挂钩。

同时，刘伟称全省将着力提高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效能，10人以上的公安派出所必须明确专职消防民警，配备2名以上消防协管员，负责派出所消防内勤工作和社区、农村的消防管理、宣传工作。加强对公安派出所民警的业务培训和考核，从事消防监督工作的派出所民警必须持证上岗。公安派出所履行消防监督检查职责纳入派出所等级评定和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对消防监督工作不达标的，取消派出所等级评比资格。

重庆沙坪坝区
端掉一非法灌装灭火器窝点

本报讯 5月21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消防支队会同质监、工商等部门突击检查消防产品非法制售活动。当来到辖区天梨路一间破旧仓库时，发现一名工人正在屋角偷偷灌装收回来的废旧灭火器瓶。

执法人员当即将企业老板控制。工人告知，该厂老板将废旧灭火器收回回来后，通过除锈、刷漆，将瓶体表面重新翻新一番后，再灌装干粉低价出售。

执法人员从生产现场找到了该企业的“出货单”，相关资料显示，仅最近两个月，该企业就至少卖出了上万个翻新灭火器。目前，沙坪坝区公安消防、工商、质检部门正对此案作进一步调查。

（万明）

北京警方一举打掉5个赌博窝点

本报讯（记者吴晓向 实习生刘秋炎）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5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会同治安总队等单位，对回龙观地区涉嫌赌博的5家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一举打掉5个利用赌博游戏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电子游艺场所，抓获违法嫌疑人26名，收缴赌博机60台，赌资6万余元。

据了解，这5家场所均是无照经营，为躲避执法人员检查，他们曾多次变换经营地点和从业人员，其中两家曾被相关部门查封并收缴

赌博机，但他们又重新购置赌博机进行非法经营。昌平警方已将涉嫌为赌博提供条件的11人刑事拘留，涉嫌赌博的15人治安拘留。

这是在北京警方将“禁赌、禁毒”纳入“4·11”专项行动后取得的重要战果。北京警方强调，北京近期将重点打击有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对网络赌博、聚众赌博活动的组织者、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和提供条件人员，以及利用娱乐场所从事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人员，将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李，李生先生不敢相信：法律有明

规定，为何劳动仲裁委员会如此裁决？于是，他向法律界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结果律师也对此相当困惑——

无奈之下，李先生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0年4月，荔湾区劳动仲裁委裁决李先生2008年2月至2009年12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裁决李先生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二倍工资差额请求无法律依据。只裁令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对李，李生先生不敢相信：法律有明

规定，为何劳动仲裁委员会如此裁决？于是，他向法律界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结果律师也对此相当困惑——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广州市荔湾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已经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

（赵新强）

学习成绩不升反降 家长诉求全额退款

培训中心“包提高学习成绩”遇官司

南京一家教育培训中心打出“经过培训包提高你的学习成绩，否则作无效退款”的广告后，牵动了众多家长的心。一位家长相信了这家培训中心的承诺并与之签订了合同，将数学成绩不理想的女儿送往培训。

岂料，当培训学时完成80%后，在接下来的学校期末考试中，女儿的数学成绩反而不如前。家长遂以培训机构违约为由将其诉上法院，要求被告全额退款。日前，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诉求获法院支持。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据悉，类似判例在国内尚属首例。

南京张女士的女儿在该市一家重点学校读高中。2009年1月，张女士了解到南京一家教育培训中心承诺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于是便前往洽谈。面对张女士的洽谈意向，该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一再给她打保票，称其女儿只要加入他们的一对一特色培训，可以保证提高学习成绩，如果学习成绩提高不了则可以全额退款。

得到这样的肯定答复后，张女士在征得女儿同意的前提下，即与这家教育培训中心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约定张女士的女儿在这家培训机构接受共98课时的一对一辅导，费用共计9000元。合同还特别约定：如果学生学习成绩不提高，将作无效退款处

理。合同签订后，张女士如数向培训中心支付了9000元培训费用。

张女士的女儿按约定加入了培训中心的辅导培训。然而，就在女儿接受完73课时的辅导培训后，在接下来的期末考试中，女儿的数学居然只考了40多分，比参加培训辅导前的考试还降了22分。张女士为不耽搁女儿的学业，中止了女儿的辅导培训，并要求女儿及时调整心态继续把功夫用在学校的课堂上。

既耗费了金钱又耗费了女儿的学习时间，结果却事与愿违。2010年初，张女士以该教育培训中心未能兑现提高女儿成绩的合同承诺，将培训中心诉上鼓楼区法院，要求被告退还9000元培训费，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3月上旬，鼓楼区法院公开开庭对案件展开审理。面对原告的诉讼主张，教育培训中心辩称：被告一直按合同履行自己的职责，原告不能仅以女儿一次成绩下降，就认为被告没有尽到责任。原告女儿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其主观上没有尽到努力，二是没有按时到校参加老师的辅导。因此自己应当对成绩下降的情况负责，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次庭审法院没有当庭作出宣判。

该案未有先例可循。休庭期间，主审法官多方听取意见、建议，并咨询了法律和教育界的专家。结合法庭查明的事实，在对案件进行综合评判和考量后，法院于5月4日对案件作出一审宣判。法院最终认定，被告对原告女儿成绩未能提高应承担全部责任，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退款的义务。据此判决被告某培训中心一次性退还原告9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已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他认为，任何学习培训的过程实际上都

是对考试成绩的约定。

法官说，当然，用一次考试成绩来确认培训效果不具有准确性，因此双方协议中关于“如成绩不提高，无效退款”的约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双方当事人愿意用这种方式作为标准，且该约定又不违反法律、法规，那么此约定应当有效。此案中，原告女儿接受培训后考试成绩不升反降，应视为被告未完全履行合同上的义务。

“对于培训机构，我们要说的是：大话好说，重在兑现。这也是本判例对培训机构提出的警示。”黄德清法官说。

（李庆）



法
明
插
图